

◆◆血溅闸门山◆◆

——《大逃港》摘编之一

“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，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，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。现在，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。连战都回来了，两党握手了。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，还有什么呢？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，不要让它再发生了。”

见到他的时候，这位当年30团的边防军战士，已经年近古稀。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，一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，1981年儿子来特区，他又跟来了。

他说，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。“你也知道那回事啊？”他反问我，“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。”

对于50年前的那一次“闸门山事件”，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，并且愿意告诉我。“但有个条件：不要提我的名字。”我理解，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，在他们心里，还是惴惴不安的。

“那是1956年的9月，或者是10月吧，几号我记不清了。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。”王志刚（化名）说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，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。有人把它说成夹门山，那是错了。为什么叫闸门山呢？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，看起来就像一座闸门一样。

那天大约是上午11点，太阳暖融融地照着，叫人昏昏欲睡。我觉得那时也怪，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烤人。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。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——”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。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，潘子良。
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，这是禁区！”我严肃地说。“我来看石头，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。”

“你不要过来了——这里是警戒线了！”我警告他。

“有什么关系，我又不会逃。”老潘还在笑咪咪向我靠近。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。

“你站住！要不我要鸣枪了。”

“怎么这样——”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，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。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，便“扑通”倒在地上。

“哗——”一声尖锐的口哨声，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。中间有妇女，还牵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。

潘子良大喊：“快——过河！”



“扑通”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只听得一片水响，一片水花。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。

就在这时，猛听见山头上“哒哒哒……”“哒哒哒……”的枪声，冲锋枪响了！

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，事情发生在 1956 年 10 月 6 日。

1956 年下半年，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，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程，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。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，于是招募一批民工开洞。

但是，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、开铺子，不会打石头，更不会砌石墙。砌地下的工程，得请外来的民工。

8 月的一天，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，部队领导一看，虎头虎脑，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。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潘子良。”

“干过活吗？”领导问，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。

“干过的——在家专干粗活。”那人说。领导点点头：“什么成分？”

“贫农。”

“嗯，把你的手给我看看。”领导说。

那人伸出手掌来，领导在上头磨了磨，粗粗的，结了茧，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。“好吧。你留下来。”

领导说，“以后你就是班长，打石民工班的班长，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，快些去，活很急。”

两天以后，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。他们是龚维卫、杨照业、王国忠、任殿奎。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、警、宪人员。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。

家乡“清匪反霸”“镇压反革命”后，他们呆不下去了，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。谁知“清查反革命”一地接着一地，看看衡阳也无法呆，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，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。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每天像野人一样，到山坡上掰点苞米、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。终于有一天，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。山洞不能再呆了。

“潘哥，往下怎么走呢？”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。

“逃香港去！”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，“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，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。”

“好啊，可那地方去得了吗？”

“去得了，从深圳跑。”



“深圳我知道的。”龚维卫说，“有铁路，我去做过生意的。”潘子良说：“就一条河，过去就到了香港。以前可以过桥，现在让共产党封了。”他说的是罗湖桥。“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。”

他们很快到了广州。潘子良带了些干粮，先去深圳镇打探，打算摸到了虚实，再靠近深圳河。竟然乘黑夜溜进了边防线，平安到达了深圳镇。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：一观察，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逻，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。

潘子良傻了。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。

“要是不行，”潘子良想，“那就又得折回去，朝云贵走，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。”他对众人说。

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，情况又变了。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，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，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。

“兄弟敢么是徐州人？”机灵的潘子良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。

“我是泗洪的。”潘子良说。

“啊，那不远啊。”那军人说，“你怎么上这来了？”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，军人显然很高兴。

“出来找碗饭吃啦。你知道，咱们家乡日子苦啊。”潘子良递上一支烟，“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，就想去干份活。”

那人大惊，压低了嗓子：“你怎么还敢说这话！你是溜进来的吧。那是几年前的事，现在不行了，要坐牢的，知道吗？”潘子良显得“懵”了。

那“江苏军人”接着又问：“你没办法边防证的吧？”

潘子良点点头。

“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。你还是快点离开这。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。”军人说。

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：“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。再说，咱老家都千多里地，怎么回呀！出门靠老乡，你给行个好吧。”

“行好？行啥好？要我也坐牢呀，快走——”那人推着他走，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，“你在家干过力气活没有？打石头。”

“打石头？”潘子良心头一喜，“打过啊，你们要人干活？”

“会砌墙不？”

“会啊，我干过这行啊。”绝处逢生！

“算你小子福分好，正好找不着人，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，碰碰运气。”



两个小时后，潘子良回到旅店。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，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。好差事！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：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，那不是送这个机会给我们跑吗？

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，让连长挑。连长是个爱兵的，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，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，显然很高兴，对那江苏兵说：“挑得不嘛，我们全要了。”

“谢长官，谢长官！”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。

“你们说在哪儿打呢？”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。

“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。”潘子良回答，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，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。

“就在闸门山吧。”江苏兵在一旁说，“那儿青石多，还都露苗了的。”

“那是禁区呀。”连长有点不放心，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。

“都是贫农吧？”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。

“都是！”潘子良带头回答说。

“贫农就好，你们要提高警惕。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。”连长说，“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，你们去就是了。”

“是！”潘子良太高兴了，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。这时，连长皱了一下眉头。后来在追查责任时，这位连长回忆说：“我当时也奇怪，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，姿势那么正规啊？”不过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，工程任务太急。打石队建立起来了，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，开始搭起帐篷，烧起炊火，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。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。

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，第一，这儿离深圳河最近，地势最有利。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头，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，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，隔开仅仅几十米，像留着一道闸门。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“闸门”中间穿过去。靠河边是一段斜坡，向香港方向倾斜，有利于快速冲跑。潘子良计算了一下，只要到达河边，冲过深圳河，就是再慢，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。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。第二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，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。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，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“20秒”。

打石队中，又有人提出了“新思维”。“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，有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能只管自己跑。”龚维卫说，“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，一起过香港去。”杨照业对潘子良说：“也对，反正要死一起死，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。”

杨照业的妻子就是潘子良的二姐。潘子良犹豫了。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，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，想的是如何保命。现在命保住了，大伙儿想法又多了。这渡河是件难事，危险性极大，弄不好是要死人的。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，在那边定下来，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。但是，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，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，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，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。



“子良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们能过去，分隔两地，要再回来接他们，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。”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，“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，让他们在共产党手里挨斗受苦，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！”

有的人眼圈都红了。“行吧！”潘子良同意了。“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，顺道就去内地接人。但是，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！”他对杨照业说，“孩子都不能带的，记住了吗？跑不动，要害事的。老婆接来，这儿是不准进的，都放在石龙镇，有火车，来这很快的。等这边的通知。”

10月5日，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，告诉他一个消息：“家属已经到了石龙。你老婆也到了。”

“好。”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。“那就把他们领过来。”

“怎么领？”

潘子良吩咐道：“你和大家都准备好。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，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。人到了深圳后，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，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！”杨照业想了一下，有个疑问：“是单个偷偷过河好，还是集体过河好呢？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？”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。

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，潘子良没有回答，只是说：“你先别问这个，听我的。人到了再说。”

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，拿到了证明，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。可是一看，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。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，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，一个十二三岁，三个才五六岁。

“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！”潘子良生气了。

乱弹琴啊！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！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，一身褴褛，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，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。他又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咬咬牙，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，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，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。

但是，他犹豫了。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“爸爸——”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，他的鼻子也酸了。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：“全都是你们害的！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，往下就拼命吧。”

他对任殿奎说，“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。拼过了深圳河，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。要是拼不过，大家就一起死。”

大家一时黯然。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。

“算了！”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，马上安慰说：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不就是一条河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几分钟的事。明晚到了香港，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！”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，露出一丝笑，情绪又上来了。

“宽不宽的嘛？”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。

“不宽，就只几米，水又不深，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，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。”

“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，”龚维卫说，“怕他们哭。”



潘子良皱皱眉：“大人背着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不能出声，小孩不准哭。哭就拿手巾捂住！听好了啊，别到时候下不了手！”一群人没有声息，但只有一个意思：放心吧！都横了心了！

“上车吧！”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，往深圳去。

一到深圳，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。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，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。但是，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，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，又看了看潘子良，表示怀疑：“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？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？”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：“是家属，嘿嘿，去煮饭的。”

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：“煮饭？小孩也会煮饭吗？不行，通通回去——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。”

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：“可在深圳旅店住宿，不能进入边防禁区。”撕下来递给潘子良：“去吧，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。三天。”

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。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，出了派出所。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，现在，管不了什么“禁区”不“禁区”，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。

天昏黑，他们出了镇子，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。路上有警戒，他们提心吊胆，绕着山走，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。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，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，值勤的不多。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，爬过了梧桐山，来到了边界附近。

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。

“到底来了。”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，不知有多高兴。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，都欢喜得抱成一团。

“不许高声！”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。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，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，一共是32个人。

“好的。”潘子良说，“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。”现在，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。“大家看见了没？”

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，“就是那——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，就是深圳河。”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，在昏暗中闪着白光，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。隐约看得见，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。河那边是一片平原，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。

“那就是香港新界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！”他说：“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，明天白天再过河。”

“明天白天？”有人不明白，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，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。“你们不懂，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。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，晚上就有十几个，你穿针都穿不过去，等于是送死。”



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，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：“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。靠河是一片灌木。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，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。越近，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，越容易成功。”潘子良交代说。

“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，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，就只两个人巡逻了。他们两个人，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，我看，怎么都看不过来。”潘子良继续说。“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十二点前的十分钟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。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嘛，快换岗了嘛。太阳又大，人最累。”潘子良说。

“我看表算过了，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，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，大约需要5分10秒以上的时间。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，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？跛子都行了啦，过河才几秒钟。等他们回头来巡逻到这里，”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，“他们已经冲过了河，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。下了水就平安了，他们就不敢开枪了。”

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甸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。“好了，没事了。现在，大家养好精神，睡觉去。”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。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，一切照常，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。

第二天一早，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。“起来——起来。”大家起来时，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，绑腿、武器是一根木棍，已经站在一个小坡上了。

大家便很快地集合。“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。”潘子良说。大家都有些紧张。“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：像我们这些人，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，进监狱、枪毙。反正一个字：死。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，才有一条活路，才能挺起腰来做人的！”

他突然“沉”了一下，显得有些悲痛“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？”眼圈有些红，“有些弟兄还不明白。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，回过头来，也抓不了我们32个人。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，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；打死我们10个，我们也能冲过去22个。值！”

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。

有女人在“凄凄”地哭……“不许哭！”有人制止说。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：“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，我在最后的最后——我也许会死，要是我死了，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，他现在住的地方是××省××县××乡××村。各位将来好了，要还记得我潘子良，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，给我多烧几炷香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一片死前的寂静。

“记住，到了香港的人，将来好了，发了，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！”有人说。

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。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，反而一点也不哭，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。

“走！”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，拿了一根木棒：“我先上，先干掉那个当兵的，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，冲！照业，走！”



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，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，就提前转了回来……

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，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。

“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是很清楚了，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打了一棒，当时我只知道，眼里是一片金花，耳朵里嗡嗡的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就迷迷糊糊倒了。后来，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，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，我马上意识到是枪声，顿时清醒了许多，我知道那是开枪了。我想爬起来，可是爬不动。就有人来救我了。”

“你还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眼睛看不清，蒙眬中，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，男的女的都有。”

“再后来呢？”

“再后来……”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。“我记不起来了，已经在医院了。留下了这个——”他拢起头发，头上有块疤。

有一种说法是，当32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时，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，有小孩突然往回跑，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，跑向北岸去抱小孩……

当年的边防新兵王志刚的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故事的最激烈处并没有铺开。只有下面这一则已经模糊不清的影印的通告：

“《关于宝安县闸门山边界发生打石“工人”集体越境事件的通报》：今年10月6日在宝安县闸门山东与香港交界地区附近曾发生一起*2名“打石工人”集体强行越界事件。这批越界犯当即为我边防哨兵*觉。在警告无效后，即开枪射击……被击毙的越境犯之尸首，计捕获6*，内男女各3名（3个小孩不计）毙伤后拖回来的各1名，越境未*获者24名，内有两名重伤越境后即死去。射击时间约持续4至5分钟，消耗子弹231发……”

所有的血泪、忐忑、勇气、憧憬与希望都化作了这几行字。其中有许多字已经辨不出，标点的使用也不讲究。相信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，这些字即使写在了历史课本，也未必能提起我们打瞌睡的眼睛。但合着这段故事，我的脑中想着这些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的人，耳边也仿佛听到了妇人的凄凄哭泣和男人们隐忍着的叹气，眼前也尽是一些想象出的鲜活画面——孩子们听到枪声后吓得掉头往回跑，潘子良义无反顾向他们奔去；有的人被枪击中流着血却依然向河对岸冲，触到了那一片土地才倒下……这一切都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，叫人压抑叫人疼痛。在那个荒谬的年代，这样的故事定是数也数不完的。那连着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细细的深圳河，冲走了千万人的血与泪，却冲不走那些离合和悲欢。

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询问文章意见时，两鬓白发，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个政协招待会，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，他新近被评为“优秀投资商”。



“是的，是这么回事。”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，眼圈都红了。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记者先生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
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。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：“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。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，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。现在，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。连战都回来了，两党握手了。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，还有什么呢？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，不要让它再发生了。”

